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

■ 赵杰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赵杰著.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5619-0881-4

I. 东…

II. 赵…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东方国家②民族性-研究-东亚

IV. G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533 号

责任印制:乔学军

责任校对:苏 琰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彩页:1

字 数:178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书 号:ISBN 7-5619-0881-4/G·0067

定 价:18.00 元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季羡林

北京大学李济季赵杰教授把他的近著《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拿给我看，意思是想让我写几句话。说的老实话，我最初从内心深处是拒绝的。原因不在赵杰同志，而在于我自己身上。我曾多次声明，我秉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及场语言研究出身的，似乎向喜欢哲学，那种有一个个哲学家就有一个个哲学的体系，我认为这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年恋少年狂”，修读东西文化的区划及它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本来所不愿读的。“理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惶惶惜惶惶”，我在嘉许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惶惶”又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

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如天高地厚此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折思维模式，以及三千年河渠，三千年河西，又拉古，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画以文化以“脱胎易世”为“鹤的舞”，许多弊端，弊端不碍，人类生存前途将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称之为“怪诞”，这是以过为进的手法，我自己承认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人说我论证不足，记老忘话，我承认你所谓一套“哲学”论证，与艾纪斯还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起死回生之诗，不是浪漫主义，更决不是什么朦胧诗，非的这些诗作，离节者有之，厌弃者也有之。对壁我有我感激，对及时者我常建陶便化仙的文章；但是决不高雅，也不辩说，因为这些诗只是是非与否，只有将来以历史书卷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很站得住，尚望莫测；但大多仍如斯也老话，同室操戈，”可

“修元补虚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不在于“奇文共欣赏”。这位学者说：“《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司古代医学向，研究现代不是学向。‘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玄奥，概念如此深奥，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百姓。”（《瞭望》，1999年第6期）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道没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容许少数巫医同姓弄医术的继续。当年鲁迅一竿棒煞中医，为世治病。不因时生世化来又又有自命为排“封建”的“科学”、是“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而出说出这种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篇有违违背了自己原来的意愿，赶快打住，这来便起草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本书中多次谈到要尊重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

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造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需要涉猎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涌现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入中国。以洪钧《文史译文证补》为始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论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就，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能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蒙古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起过西方学者，就是想问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显学”，中国国境以外泛向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举乏。满族一入主中国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痛制了这个老

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杭）右史曾兼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专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 W. Fuchs, Halmisch 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哲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衡）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聘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张深。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继无向译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我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几能有新的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韩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

六

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读甚随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有弄清楚，更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就只有寄希望于如李济思不手佳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己，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很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既有御道。”我说在科学青年学者：学问中既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智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峰。

1999.7.14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季羨林

北京大学东语系赵杰教授把他的近著《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拿给我看，意思是想让我写几句话。说句老实话，我最初从内心深处是想拒绝的。原因不在赵杰同志，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年忽然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怪论”是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制

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论”，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哲学”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奇文共析赏”。这位学者说：“《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 21 世纪。”（《群言》，1999 年第 6 期）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图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而出说出这样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来读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本书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

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能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国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 W. Fuchs、Haenisch 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

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己,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1999.7.14.

为“曙光”献礼（自序）

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依稀可见，当我们即将听完 20 世纪老人的谆谆别语，隐隐倾听 21 世纪报童的呼唤声时，作为一个跨越千年历史烟云迎接新世纪曙光的东方人，我们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新世界的和平鸽已经聚向起飞地，当我们刚刚知道中美元首互访后确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新形势而高兴时，作为一个位于东西方文化交锋地的东亚人，我们的思绪也是感慨万千的。站在东亚崛起的世纪门槛，面对人类千年嬗变和东西交流的时空交叉点研究东方文化，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季羨林先生最近指出：“尽管谁也说不清下一个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国内外都有不少的人认为或者主张或者预言，21 世纪是东方重现辉煌的世纪。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东方都将在继承着西方学术之文化已经打牢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文化来济西方文化之穷，大大地发扬自己文化的优势，将人类文化发展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为世界文化开辟一个新天地。”季先生前些年对东西方文化的一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形象比喻，揭示了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相互补充的运行规律。今天，季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了新世纪东方文化在 20 世纪西方学术文化基础上的济补作用、发扬作用和创新作用。可以说，东方文化在 21 世纪发挥的作用将远比 20 世纪要大，这已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

为什么东方文化在 21 世纪具有这样大的魅力呢？一是因为，人

类从数千年的农业文明跨向千余年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从东方田园牧歌式的和睦文化向西方机器轰鸣式的竞争文化的过渡,而工业文明走到了环境污染和弱肉强食的尽头,必然又要寻找新的文明形式,这种文明又是以原有的东方农业的精神文明为基础,但又是经过工业文明洗礼了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它或许叫做农业文明加上工业文明后的“环境文明”(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保护绿色的自然环境和保护和平的人文环境)。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而环境文明的理论基础早已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论述中形成了,开发东方文化这一丰富的宝库,对人类在 21 世纪抑制物欲横流,治理环境污染,会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东方文化的另一魅力则是精神文明对于人的极端重要性。费孝通先生多次说过,现代高科技使人类的核武器具有毁灭地球许多次的巨大杀伤力,一些大国经过核实验都已具备了这种能力,所以,新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发展科技杀伤能力,而是培养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不动武力的控制能力。而控制能力本身就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这方面,东亚各国在人伦关系上的“和合”(和睦,合作)文化以及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等,对医治西方物质现代化走向极端时的精神空虚,显然是一方不可多得的良药。中国古代的“君子动口不动手”,正是今天“对话代替对抗”的代名词。其实,人类要想在 21 世纪化解民族矛盾,抑制宗教战争,甚至是控制核大战,最灵验的“魔法”不是高科技的新式武器,而是以东方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精神修养的提高和升华。共存在“地球村”里的村民不是靠胳膊粗力气大导致两败俱伤,而是靠道德的法则自觉地约束自己,形成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而不同”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多元族群。

所以,东方文化的发展规律,东方文化的理论提取,东方文化的实用价值,都迫切需要学者们研究和整理,为 21 世纪对精神追求如饥似渴的新一代文明人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

在东方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中,东亚文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交融,东方“德”文化和西方“法”文化的结合,尤其在用东方文化指导现代化,使经济快速崛起等方面,东亚文化可以说走在了整个东方文化的前列。这一地区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丰富的现代经济建设经验;既有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优化融合,又有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既有物质生活的飞跃,又有精神世界的超拔。尽管最近东亚也受到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核心地中国的人民币保值,不仅稳定了地区内的经济形势,也对世界的金融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再一次显示了综合性的东方文化中宏观调控的威力。可以说,东亚这种带有浓厚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上一种先进的文明类型。

东亚文化不同于西方又领先于东方的一些特点往往体现在所在地区的民族特性上,东方文化中东亚民族的一些共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厚德载物的和睦品格;
2. 崇尚群体的合作精神;
3. 善于学习,善于结合的适应才能;
4. 自强不息,拼搏敬业的坚强毅力;
5. 兼顾个体分析但又侧重整体综合的思维方法;
6. 既有自信又有忧患的民族意识。

这六点在本书里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不赘述,但读者只从这些提纲挈领的论题中便可体会到富国兴邦首先要奠定精神文明基石的至理。它们分明是东方人批判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且又优化组合了的东方文化,是把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东亚地区特殊发展相结合后所形成的精神支柱。中、日、韩以及近古的蒙古、满洲在本民族的发展进化中都曾遇到过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之间交融的空间复合,也曾面临过传统历时和断代共时错综交叉的时间复合,东亚民族所积累的文化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今天,我们从中国东部、日本、东亚“四小龙”的经济飞速发展,也不难预见以上六条在新世纪文明中所起的思想领先作用。因此,从东亚经济现代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中,从“中国特色”和日韩“儒商”的内涵中去解读东亚文化,进而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不失为研究和弘扬东方文化的一个新尝试。

三

从广义上说,有关东亚文化研究的论著已不算少数。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东亚研究对象除了中国大陆外,大多是日本、港台、新加坡,蒙古虽然经济不够发达,但由于元蒙历史文化和今天的内、外蒙关系等,研究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但对东亚有着较大影响且又有着深厚文化潜力的两个重要研究对象——满族学和韩国学,却近乎成为东亚文化研究的两个弱项。这是因为,满族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未被重视,甚至忽略到满族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的程度。比较受重视的清史研究也多局限于满汉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且也是从正规修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文化史的视觉来看问题的。因此,满族的文化价值对一些中国汉族人尤其是跨世纪青年人仍是一片空白。另外,建国以来,中国和朝鲜关系密切,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韩国却没有来往,1993年中韩正式建交,迄今也只有7年,中国学人对韩国所知甚少,韩文化的价值对现当代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片空白。

基于东亚文化研究中满、韩两个弱项的事实,本书重点列篇专论满、韩民族的文化价值,其中满族的文化价值多在和汉族融合中得以体现,故书中论述满汉融合的文章较多。笔者10多年来经常调查研究满族语言文化,对此深有体会。有关韩国的文章,多是笔者自己在韩国一年半的亲自调查和耳闻目睹所得,故单论韩文化的文章较多。